

4.  
K512.4

Z85

Последние дни династии Романовых  
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日子

О кризисе верхов до гибели царизма  
——沙皇灭亡前的上层危机

祝政宏著



A0770859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 林星海  
封面设计 张幼农  
责任技编 王 颖

书 名 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日子

---

著 者 祝政宏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邮编 518026  
印刷者 深圳市机关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80(千)  
版 次 2000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0年6月第1次  
印 数 3000册

---

I S B N 7—80654—207—8/Z·3  
总 定 价 240.00元(共10册)

# 前 言

## (一)

沙皇俄国在1917年二月革命短短的七、八天中就轰然垮台，迅速倾覆。除了自身参加帝国主义战争造成国内空虚、布尔什维克党进行长期的革命宣传和武装斗争准备等因素外，究竟还有什么原因促使俄罗斯帝国这个庞然大物败亡得如此之快？换言之，在二月革命前俄国还发生过什么世人不大知晓，却足以渐渐消磨帝国生命的惊心动魄的事件呢？

在兰州大学历史系读苏联史研究生时，这个问题一直强烈地吸引着我，促使我下决心从浩繁的俄文资料中去挖掘有价值的史料，寻求解开这个历史之谜的答案。在大量的原始资料，例如7卷本的《沙皇制度的崩溃（1917年临时政府非常侦讯委员会审讯和口供速记记录）》、《国家杜马会议速记记录》、《尼古拉二世夫妇通讯集》、《红档》、《维特伯爵回忆录》、《过渡时期（1904—1908年）的法律文件》等资料中，这个答案如冰山的一角逐渐浮出水面。人们看到，19世纪末期特别是沙皇灭亡前的十余年内，俄国曾出现严重的、旷日持久的上层危机。它围绕两条主线而展开：以自由主义、立宪主义为政治纲领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与死守专制防线，尔后丧失了还妄图夺回失地的上层反动贵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受资产阶级自由派影响的政府大臣、皇族大公和军队将领力促沙皇接受立宪制度，对社会各界作出重大让步并清除宫廷奸党等“黑暗势力”，在这些活动中引发出的冲突、争斗乃至暴力事件。正是这些上层的冲突、矛盾、争斗、撕咬消蚀、耗费了本已衰落的沙皇制度的最后部分元气，使它在汹涌澎湃的人民革命浪潮中再无往昔的力量和威风与之抗衡，最终上演了庞大帝国败亡之速令人惊讶的一幕。

## (二)

列宁精辟地概括了上层危机的突出表现是“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第229页)。俄国的上层危机从19世纪末尼古拉二世登基后便初现端倪。新沙皇一上台就表达了捍卫专制主义的决心,其周围的“死硬派”(上层极右派的代用语)也为之推波助澜。但这些举动只不过是掩盖当时深刻的社会矛盾:政府从经济上扶植资产阶级引起其政治上的活跃;地方自治局屡屡发起请愿运动,要求立宪;工农运动随着经济危机、战争失败的出现而加剧;内务部头目坚持高压政策,其结果是内务大臣、警察头目接连被刺,社会各界的运动愈演愈烈。此时,沙皇集团内部也发生分歧和动摇。某些受到自由主义影响的高官重臣向沙皇提出程度不同的政治改革方案,预示上层危机的出现。

1905年革命中,人民群众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和资产阶级自由派要求立宪的运动交织在一起,迫使沙皇步步退让——从许诺召集国民代表机关到设立咨询性的国家杜马,再到十月政治总罢工的惊涛骇浪中颁布“10月17日宣言”,允诺赐予国家杜马立法权、给予公民以自由。在10月事件中,沙皇无法守住王朝的生命线即专制制度,而被迫放弃之,这是上层危机深化的集中表现。此后,一系列宪法性文件的颁布和国家杜马的召开标志着俄国步入立宪的轨道。然而在制宪过程中,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就国家制度的改革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冲突,这表明俄国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方向演化的进程中充满了种种艰难和曲折。

依照“六月三日选举法”组成的第三届国家杜马是沙皇尝试推行波拿巴主义的政治框架。但“六三体制”形成不久就矛盾重重,以致后来出现“议会危机”、“内阁危机”。总理大臣斯托雷平旨在“安定俄国”的一系列改革遇到反动贵族的顽强抵制,大部均告失败,自己也作了沙皇的政治牺牲品。由于资产阶级自由派与反动

贵族在众多问题上冲突不断，“六三体制”陷入危机。

大战期间俄国的上层危机达到高峰。沙皇政府在各方面准备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参加世界大战，引发并加剧了内部的矛盾。资产阶级在自己的“爱国激情”没有得到预期回报之后，转变策略，利用俄军在前线的失败发起抨击政府的反对派运动的高潮。它以国家杜马为中心组成“进步同盟”，主张建立有自己参加的“信任内阁”、“责任内阁”。上层贵族也发生离析和动摇，部分大臣、大公、将军力劝沙皇迎合社会舆论，作出更大的让步，建立享有社会信任的政府，甚至议会制的“责任内阁”。沙皇在大战期间亲近以神秘主义指导国家政务、军务的“宫廷党”更遭天怨人怒。皇族不能容忍这股邪恶势力控制影响沙皇，他们为了“拯救沙皇”而刺杀“长老”拉斯普庭，演出了上层危机最后的惊险一幕。沙皇最终同意“赐予”责任内阁，但为时已晚：二月革命业已爆发。统治俄国三百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大厦轰然倾覆。

### (三)

俄国的上层危机始终围绕资产阶级自由派与反动的旧贵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条基本主线而展开。

自 1861 年废除农奴制后，俄国社会有两个阶级与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一个是经济上逐渐强大到足以管理国家、政治上却毫无权力的资产阶级，它以西欧传人的自由主义、立宪主义为思想武器，向沙皇不断发出不满乃至愤恨之声。另一个则是沙皇传统的支柱贵族地主阶级，它在 1861 年后发生的变化最为显著。部分贵族顺应经济大潮成为资产阶级化的新式贵族，新贵族及其政治上的代表自由派贵族作为地方自治局的主人，异常关心此后如何清除农奴制的残余，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他们认为，如没有自己这些“庄园的主人”的参与，国家不可能制定出彻底根除农奴制残余的法律。因而，要求建立有各阶级代表参加的全国性代议机关，逐渐成为他们的政治目标。由于沙皇政府拒不接受其纲领、地方

自治局在19世纪末变为政府反对派的策源地。另一部分贵族不能适应变化了形势，他们在经营无方、债台高筑时便大片出售土地，沦为破落贵族。这些丧失了土地的贵族在经济上一落千丈，便死死地抱住政治特权不放。其上层政治代表“死硬派”推动沙皇抵制一切政治改革、拒绝一切重大让步的举动，便是这种心理的鲜明反映。

“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必然要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自由主义反政府派”(《列宁全集》第6卷第249页)。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自由派贵族的代表于19世纪末建立政治组织，从“聚谈”、“解放同盟”到正式成立政党，一直以“立宪”、“参政”为政治目标。他们在国家杜马内外同反动的贵族展开斗争，向沙皇政府持续发起反对派运动。在1905年和大战期间，这种反对派运动借助人民群众运动的高涨曾掀起数次高潮。

此时期，俄国资产阶级与沙皇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可以说，二者之间既有合作的一面，又有争斗的一面；但在特殊的政治条件下，其争斗的一面会上升为主要方面。不仅如此，资产阶级在这种争斗中起到的客观历史作用也是不容忽略的。在1905年革命爆发前后，自由派运动揭露了专制主义的落后和腐朽，这是迫使沙皇放弃专制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六三体制”期间，自由派与反动贵族在国家杜马内外的冲突促使沙皇推行波拿巴方针的这个政治框架出现裂痕，难以为继。大战中，资产阶级猛烈抨击军事上不断失利的沙皇政府，鞭挞政府重臣及“宫廷党”种种令人痛恨的行径。这大大损害了现存政权的威信，打破了人们对沙皇的某些幻想。并且，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往往是在革命尚不能直接深入的地方进行。这些活动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有利于革命阵营。

无须否认，资产阶级自由派攻击政府、逼迫沙皇向社会作出重大让步的目的在于防止革命。但出乎它意料的是，这一行为客观上不仅推动了革命的进程，而且促使革命迅速取得成功。资产阶

级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它的思想武器是自由主义、立宪主义。这些思想理论是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其核心是颁布宪法,建立享有立法权的国民代表机关。这些理论显然直接针对当时的沙皇专制。自由主义、立宪主义可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伤及革命思想、引导人民群众走上非暴力斗争道路的作用,也具有消磨、溶解封建专制,使之力量大为削弱的功力。如果说革命是致沙皇政权于死命的一剂猛药,那么自由主义、立宪主义则是消蚀、瓦解沙皇专制的一种腐蚀剂。人们看到,正是在资产阶级与沙皇当局旷日持久争斗的上层危机中,这种“腐蚀剂”发挥了其慢性的效力,它渐渐消蚀、侵袭了沙皇政权的机体,使它千疮百孔,更加衰弱。这样沙皇政权在经历了异常奇特的打击——机体被慢性消蚀之后,便在人民革命的风暴中迅速灭亡。二月革命之所以很快取得胜利,其原因就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曼诺夫王朝是在俄国广大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的共同打击下倾覆的。

#### (四)

同工人运动史、党史、外交史等煌煌巨著相比,以往苏联史学家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制度的演变、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矛盾等上层统治方面的研究十分薄弱,这方面的专著几乎没有。从70年代起,苏联开始注意研究这一领域,出版了一些有关专制制度演变、国家杜马、“六三体制”等方面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段历史中的不足。而我国苏联史中这方面的书籍可谓凤毛麟角。

本书试图在原始资料和前苏联史学家某些成果的基础上,为我国研究这一问题尽绵薄之力。需指出的是,本书与一些苏联史学家在涉及这一领域的众多问题上观点不尽一致,甚至完全不同。这些问题主要有: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资产阶级自由派;贵族和沙皇制度发生了何种演化;国家杜马是否为议会;新版《根本法》是否为俄国宪法;1905年后俄国确立的何种政体;1907

年“六三事件”是否为“政变”；俄国的波拿巴主义的内涵包括哪些内容；波拿巴主义延续到何时终结等。对上述这些问题，有的放在本书的相关段落中加以评述，有的则在后几章单独以较为详尽的篇幅展开。笔者提出上述问题的观点和结论，希望能与前苏联的史学家商榷。

另外，由于本书不是全面地论述此时期俄国史的书籍，因而凡与“上层”关系不大的内容都有意略过，敬请读者注意。

在此书出版之际，我深切地怀念已故的导师——德高年劬的李天祐先生，诚挚地感谢另一位导师——治学严谨的李建先生，他们对我学术上的培养和教诲使我永生难忘。此外，我还要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师兄、同仁。

此书经新疆大学政法学院著作编审委员会通过，给予资助；深圳海天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亦为它的出版竭尽心血。没有上述单位的帮助，此书无法面世。

谨以此书献给他们。

作者

1999.12.20



# 第一章 沙皇治下的俄罗斯

## 一、沙皇制度和农奴制度的历史变迁

沙皇制度(Царизм)和农奴制度(Крепостное право)是最具俄国特色的两大政治制度。不了解它们,便无法领会整个俄国历史的真谛。

俄国虽没有经过奴隶制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但具有某些奴隶制特征的农奴制却延续得特别长,社会压迫尤为深重。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封建国家通过立法手段,一步步将农民完全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制最基本的特点是农奴失去人身自由,对主人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19世纪当这种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在西欧各国基本消声匿迹时,俄国的农奴制还在发展,直到19世纪中叶,俄国最高统治者在社会各方面的推动下,认识到保存这种腐朽落后的制度是国家衰弱的根源,才下决心予以废除。这次改革局部地破坏了封建的生产关系,由此引起生产力的显著提高。

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之上的是沙皇制度。封建贵族地主作为俄国的统治阶级,为了确保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种种特权,尤其是对农奴的统治,他们需要依赖一种国家制度。沙皇制度就是保障贵族地主对农奴实行超经济强制的最好的政治制度,它是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俄罗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后建立的,经历了等级君主制阶段,到专制君主制时臻于完善。

### (一)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历史概要

沙皇俄国是对15世纪末、16世纪初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称呼。在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成前,曾经历了基辅罗斯和莫斯科公国时代。

9世纪,北方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瓦良格人(Варяги)南下征服东斯拉夫人。当时东斯拉夫人已走完漫长的原始公社社会而进入

阶级社会,建立了以基辅、诺夫哥罗德等城市为中心的准国家组织。公元 862 年瓦良格人的首领柳立克应诺夫哥罗德贵族的邀请,派兵南下,旋即平息了城中的内讧,自称王公,建立了柳立克王朝。此后柳立克的继承奥列格继续沿第聂伯河南下,于 882 年占领基辅,建立了以基辅为中心的古罗斯国家,史称“基辅罗斯”,(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其版图东起顿河,西至喀尔巴阡山,北起波罗的海南岸,南抵黑海北岸,约 100 万平方公里。

基辅罗斯是早期封建国家。9—10 世纪东斯拉夫人仍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的残余——村社(Община)。在这种制度下,森林、草原、荒地、水源都为公共财产,由村民共同享用;耕地则定期分配,其使用权可以继承。

基辅罗斯的统治者由大公(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王公(Князь)和波雅尔(Бояре)(波雅尔,10—17 世纪俄国封建大贵族阶层,有时译为“大贵族”、“领主”、“领主贵族”。——作者注)组成。大公率领亲兵到所属居民中去“索贡巡行”,即挨家挨户地向居民征收贡品,如毛皮、蜂蜜等,还把敢于反抗者作为俘虏而抓走。每年春天他们将所得的贡品和俘虏贩运到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出售。基辅大公还把征战作为对外贸易的补充,不断发动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

基辅罗斯经历了弗拉基米尔大公(980—1015 年在位,下同)“智者”雅罗斯拉夫大公(1019—1054 年)的昌盛时期后开始出现分裂的趋势。莫诺马赫(1113—1125 年)任基辅大公时力图加强大公的权力,但他也无法改变封建割据的局面。12 世纪,基辅罗斯分裂为众多的独立公国,其中较大的有 12 个,如斯摩棱斯克公国、梁赞公国、契尔尼果夫公国、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公国等。基辅大公的权力名存实亡。

东斯拉夫人的分裂为外来入侵者提供了极好的机会。13 世纪初,新兴的蒙古人远征欧洲,首先进入罗斯诸公国,攻城拔地,迅速攻克梁赞、弗拉基米尔、莫斯科等城。此后又攻陷基辅,在伏尔

加河下游的萨莱建立“金帐汗国”，统治罗斯及西部的广大地区。金帐汗国采取间接统治的方法，它保留了罗斯各公国的封建政权，对各王公实行“封诰”即向效忠金帐汗国的公国颁发治理国家的证书，使其臣服于己。受封者有权继续统治自己的公国，征收本国对金帐汗国的贡赋和军役。金帐汗国还宣布从王公中挑选一人，册封为“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获得这一称号者可代替金帐汗国向全罗斯征收贡赋，并取得对其它王公的支配权，因而诸王公视这一称号为特殊的荣宠而相互争逐。金帐汗则以此为诱饵，挑起王公之间的矛盾，以便分而治之。

这个时期，东北地区的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公国由于弗拉基米尔城特别是莫斯科城的兴起而在罗斯诸公国中占有突出地位。罗斯托夫—苏兹达尔是雅罗斯拉夫的后代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等人的领地，12世纪公国境内出现了许多新城，其中最重要的是莫诺马赫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弗拉基米尔城，还有此后兴起的莫斯科城。莫斯科原是一个不起眼的村落，属公国内弗拉基米尔王公的领地。最早在史料中记载莫斯科活动的是1147年，这一年莫诺马赫之子“长手”尤里(1125—1157年)将这个莫斯科河沿岸的城堡收到自己手中，并在这里接待了他的同盟者。莫斯科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它扼奥卡河、伏尔加河商业要冲，为水陆交通枢纽，并与斯摩棱斯克、梁赞、契尔尼果夫等公国都不远，交通便利。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仅大大促进了此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使它逐渐成为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公国的政治中心之一。

“长手”尤里不仅率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公国脱离基辅而独立，并且两次出兵占领基辅，兼任基辅大公。尤里之子安德烈(1157—1174年)迁都弗拉基米尔，公国遂改称为“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以后，安德烈再次洗劫基辅，从此基辅便一蹶不振。弗拉基米尔取代了基辅的地位。安德烈的后继者“大窝”弗塞沃洛德(1176—1212年)对内镇压波雅尔的反抗，加强王权，对外继续扩张势力，用武力将梁赞、契尔尼果夫、斯摩棱斯克等王公置于自己

的附庸地位。据当时的编年史记载，“有大小 300 个王公都听命于他”。<sup>①</sup>弗塞沃洛德正式采用“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称号而号令罗斯诸王公，这个时期是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的鼎盛时期。由于各种政治经济上的矛盾无法解决，在 13 世纪上半期蒙古人入侵时，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分裂为许多小公国，这时莫斯科公国开始崛起。

14 至 15 世纪，在同蒙古人周旋时，莫斯科公国渐渐发展为东北罗斯的政治经济中心，成为统一罗斯诸公国的核心。除了极为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外，莫斯科四周有诸公国作为屏障，又距离蒙古统治者和其它入侵民族直接蹂躏的地区较远，不易受到外敌的直接攻击。莫斯科王公借助这些天然的便利条件，一面与蒙古统治者周旋，一面兼并邻近的领土，并采用各种灵活乃至狡猾的手段提高了自身在罗斯诸公国中的声望。丹尼尔(1293—1303 年)在位时兼并了周围一系列小公国，使疆土面积几乎扩大了两倍。但此时莫斯科还不是强邻特维尔公国的对手。14 世纪初，特维尔大公从金帐汗国手中取得“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的称号，仍然对莫斯科公国占有明显优势。

莫斯科公国地位的崛起始于伊凡一世(1325—1341 年)。伊凡为击败特维尔取而代之，充分施展了政治阴谋手段。他一方面对金帐汗国阿谀逢迎，用重金贿赂金帐汗及其妻妾和近臣，以取得他们的欢心和信任，为此他获得“伊凡·卡利达”的绰号；(“卡利达”为俄语“钱袋”之意)另一方面不惜利用金帐汗打击和清除妨碍他扩张势力的同族王公。当特维尔发生反对蒙古人的起义时，伊凡主动向金帐汗请纒，对蒙古人表示愿意为镇压起义效劳。他亲自率领蒙古大军前往特维尔镇压起义，从而借机惩治了自己强大的对手。1328 年伊凡终于获得“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的称号，以后他还把全俄东正教大主教的驻节地从弗拉基米尔迁至莫斯科，并动工修建圣母升天大教堂。从此，莫斯科公国开始成为罗斯的政治、宗教中心。

伊凡一世加强莫斯科公国地位的政策为他的后继者所继承。其孙季米特里(1359—1389年)趁金帐汗国内乱之机,不断扩展领土,对邻近各国发动长期的战争。他首先制服了下诺夫哥罗德公国,随后粉碎了特维尔与立陶宛的结盟,最后迫使特维尔承认莫斯科大公是“兄长”,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莫斯科公国作为罗斯诸公国领袖的地位。14世纪下半期,金帐汗国内封建割据不断加深,内讧连年不已,军事力量大为削弱,这为罗斯摆脱蒙古人的统治提供了难得的良机。伊凡三世(1462—1505年)于1478年停止向金帐汗国缴纳贡赋,以此作为拒绝接受蒙古人统治的公开信号。1480年,伊凡三世在国民的支持下率军与蒙古军队决战于乌格拉河。最后,蒙古人仓皇逃遁,延续两个半世纪的蒙古统治宣告结束。在此期间,伊凡三世还陆继征服了雅罗斯拉夫尔公国、罗斯托夫公国、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和特维尔公国,将东北罗斯的绝大部分领土统一于莫斯科公国的版图中,由“几个平等王公中的第一个”飞身而“成为整个东北罗斯唯一的君主”。1485年,莫斯科大公正式称“全罗斯大公”。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继承其父的事业,兼并了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梁赞公国,从东北罗斯的唯一君主成为“统治全俄罗斯的君主之君主”。<sup>②</sup>至此,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基本形成,它的疆土扩大到280万平方公里。其疆城北达白海,南至奥卡河,西抵第聂伯河上游,东到乌拉尔山脉,成为欧洲幅员最大的国家。

统一的国家形成后,俄国即开始侵略扩张。伊凡四世(1533—1584年)时,俄军征服喀山、阿斯特拉罕两汗国,迫使伏尔加河流域各民族均臣服于俄国。接着俄军越过乌拉尔山脉,经过10余年的征战将西伯利亚汗国的广大地盘划归俄国。彼得一世(1672—1725年)为夺取出海口,与瑞典等国展开长达20余年的北方战争,夺取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土地,终于取得了梦寐以求的出海口,为争霸世界打开了通道。彼得一世自恃征战有功,授意枢密院授予他“皇帝”称号,国家也随之改称为“俄罗斯帝国”。此后,俄国的

侵略扩张方针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从未停止实施。

## (二)等级君主制和专制君主制

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父子两代建成了俄罗斯统一的国家。随着他们统治疆域的扩大,其地位和权力也就发生相应的变化。

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后,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一事便提上日程。这首先表现为莫斯科大公地位的上升和神圣化。过去伊凡三世只是东北罗斯诸王公之一,如今他已从“同等人中的第一位”变为俄罗斯国家唯一的君主。他不再满足于“大公”的称号,开始寻求更合适的称谓,从而使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于自己一人手中,不仅能够镇压反抗的民众,而且可以威震桀傲不驯的王公。

当伊凡三世攻打诺夫哥罗德时,对方的使者没有像过去那样称伊凡为“老爷”,而是称他为“国君”,这为伊凡三世兼并对方提供了借口,并使他产生今后应拥有专制君主权力的念头。在统一的国家建立后,许多文件中已经开始称伊凡三世为“专制者”(Самодержец)或全罗斯的“沙皇”(Царь)。“沙皇”是古罗马独裁者“凯撒”的俄语音变。伊凡三世有时自称“沙皇”,表示对这个称号的认可。这时,豪华气派的建筑和装饰,繁文缛节的各类规矩和对君主的顶礼膜拜已在他的宫廷中出现。

伊凡三世与拜占庭帝国的联姻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帝国攻陷,东罗马帝国灭亡。在威尼斯和罗马教皇的撮合下,伊凡三世和拜占庭末代君主的侄女索菲娅公主结婚,这个政治联姻大大提高了俄罗斯的地位。在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伊凡三世便以拜占庭皇统的直接继承人、“真正的东正教”的世界首领自居,把拜占庭的双头鹰徽号作为俄国的徽号。每逢隆重盛大的日子,伊凡三世总是坐在镶有宝石的王座上,头戴“莫诺马赫王冠”,以示君主威仪。据传说,这个王冠是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传下来的,而莫诺马赫又似乎是从与他同名的拜占庭皇帝手中得到的。<sup>③</sup>瓦西里三世则被称为“统治全俄罗斯领

土的君主之君主”，原先的罗斯诸王公都必须遵照他的意志，为他效命。莫斯科人公开宣称“君主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sup>④</sup>

尽管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父子的权力已大为提高，但还是受到俄国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条件的制约，他们的权力远未达到专制君主的地步。这时，俄国尚处于等级君主制初具规模的阶段。

罗斯诸王公原来都是自己领土上独立的“君主”，如今成为统一国家的封建领主，一些王公心怀不满，与莫斯科大公的冲突时有发生。另外，波雅尔即显赫的大贵族也存有较重的离心倾向。伊凡三世对这些仍拥有很大势力的王公、波雅尔采取既遏制又利用的政策，他从这些人中挑选出显贵者组成一个参政机构——波雅尔杜马（Боярская Дума），使之成为直属大公的最高管理机关和咨询机关。当时的政治机制是，“治理国家的一切最重大问题都由大公和杜马商讨决定。在决定非常重大的问题，如关于战争与和平，大公遗诏等问题时，则召开波雅尔杜马和教会主教的联席会议，有时还有中小贵族的代表参加”。<sup>⑤</sup>在大公和波雅尔杜马之下，设有分掌中央各部门事务的管理机关，被称为“政厅”（另译为“衙门”、“部署”）。16世纪初时有10个“政厅”，长官由王公、贵族、法官组成，但实权逐渐落入管理日常事务的官吏——司书手中。地方设总督，总督代表大公和中央在地方行使行政、司法、征税大权，还兼地方军事长官。

等级君主制在伊凡四世时确立。1574年，伊凡四世郑重地采用了“沙皇”的称号，这一举动表明了他加强君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用的意图。然而伊凡四世的君主制也没有达到专制的地步。他在依靠门第不高的А·Ф·阿达舍夫等人采取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加强沙皇权力的措施的同时，仍依赖波雅尔、高级教士和服役贵族。1549年2月，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缙绅会议”（Земский собор）在莫斯科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波雅尔、高级教士和司书等阶层的代表，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关于改革中央和地方管理机构和编纂新法典。从此，国家的重大问题都要经过缙绅会议的同意，取

得等级代表的认可。1549年缙绅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俄国等级君主制的确立。

伊凡四世以后虽推行“特辖制”，依靠服役贵族残酷打击波雅尔贵族中的反抗者，但这次只是实行君主专制的一次尝试。当割据势力被基本削弱，而建立君主专制的条件尚未成熟时，伊凡四世又废除了“特辖制”。他的后继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维持着这种等级君主制度。

1613年的缙绅会议可以说是等级君主制的典型表现，它解决的是推选沙皇这种国家最重大的问题。这次会议的规模较为庞大，代表的范围也较为广泛。50个城市约700人参加了会议，代表了波雅尔、教士、莫斯科及外省服役贵族、小土地所有者、市民和极少数农民阶层的利益。由于柳立克王朝断嗣，缙绅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选举沙皇。会议最终推选了与柳立克家族有亲戚关系的米哈依尔·罗曼诺夫为沙皇，从此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1613—1917年）。米哈依尔即位后，虽自称是“专制君主”，但考虑到自己还没有掌握全部权力，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仍需同各等级的代表磋商解决，于是在他统治初年经常召开缙绅会议。除了波雅尔、高级教士外，服役贵族、商人、市民的代表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缙绅会议上。

沙皇阿列克赛（1645—1676年）在位时，中央政权得到进一步加强。为了制定新法典，1648—1649年召开了最长的一次缙绅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约350人，除高级教士、波雅尔、首都和外省的贵族、司书的代表外，还有莫斯科同业公会、莫斯科射击军、市民的代表。会议对法典委员会编纂的法典草案进行讨论和修改补充，于1649年通过了这部法典。法典加强了沙皇的权力，反映了俄国国家制度的变化，从法律上表明俄国从等级君主制开始向专制君主制过渡。

1649年后缙绅会议就很少召开了。1653年的缙绅会议是为讨论吞并乌克兰而召开的，它事实上是有各等级代表参加的最后一次缙绅会议。17世纪下半期，沙皇往往只召开个别等级的代表



会议,有时只召集波雅尔和首都的服役贵族参加会议,讨论当前需要作出的决定。有时甚至既不召开波雅尔杜马会议,也不召开缙绅会议,只召集个别亲信商讨国事,作出决定。沙皇逐渐不再依靠等级代表组成的缙绅会议,这表明等级君主制开始衰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专制君主制形成于18世纪,它是由俄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沙皇彼得一世确立的。

彼得一世为使俄国跻身于欧洲先进国家之列,决定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加强中央集权,扩大沙皇的专制权力则是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彼得首先从限制君权的波雅尔杜马开刀,他把部分波雅尔调离京城,致使杜马无法开会。1699年设立“近臣办公厅”(Ближняя Канцелярия)作为彼雅尔杜马的办事机构。这个“办公厅”由彼得的亲信组成,是财政、行政的监督机构,拥有实权,能够决定重大问题。这样,古老的波雅尔杜马失去了原来的作用,由“近臣办公厅”取代了部分职权:彼得在需要商讨重大问题时,不再召集波雅尔杜马,而只需与“办公厅”的几位亲信商讨即可。波雅尔杜马的权力最终被“枢密院”所取代。1711年彼得在与土耳其帝国宣战的当天,签署了建立枢密院(Сенат)的诏令,宣布当沙皇离开京城时,枢密院代表沙皇处理重大国事。显然这个机构当初只是一个临时的国家管理机构,但此后枢密院不但没有撤销,反而权力越来越大,变成直属沙皇的正式最高国家管理机构。它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整个系统,从财政预算、贡赋征收到海陆军的编制,都处于它的管辖之下。此外,枢密院还享有制定各项重大法令的权力。枢密院由枢密官组成,这些人并非出身名门望族,但都是彼得的亲信,支持彼得的政见。为了防止枢密院滥用职权,彼得特别设立了总检查官这样一个权力巨大的职位。总检查官由他最信赖的人担任,只对他本人负责。彼得称这个总检查官为“国君的眼睛和国家事务的司法稽查官”。<sup>⑥</sup>

从1718年起,彼得进一步改革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中央的